

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汉诗英译的两种策略^①

张智中



摘要：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是汉诗英译的两种策略。学术性译诗重在传达原诗的基本信息，强调翻译的忠实性；虽然如此，有时却也因为新鲜大胆的直译而不乏创造性与新颖性。文学性译诗重在传达原诗的审美信息，强调译诗的文学性；虽然如此，创译理论指导下的文学性译诗，却不时遭到翻译批评界的诟病，责其不忠不信。不过，文学性译诗在遭受西方汉学界最初的批评之后，最终还是得到了肯定与赞赏。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各有其利，各有其弊，将长久并存，以达多元互补之目的。

关键词：汉诗英译；学术性译诗；文学性译诗；多元互补

Academic Poetry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Poetry Translation as Two Translation Strategies ZHANG Zhizhong

Abstract: Academic poetry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poetry translation are two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in C-E poetry translation. Academic poetry translation emphasizes faithfulness in transl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e original poem, while it sometimes does not lack originality or creativity owing to its bold literal translation. Literary poetry translation pays attention to reproduction of the aesthetic information in the original poem, while highlighting the literary quality of a translated poem. Yet literary poetry transl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y of literary creation, is often criticized by scholars for its “unfaithful” translation. Fortunately, after the initial criticism, literary poetry translation finally wins the readers’ appreciation. Academic poetry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poetry translation, each with its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will coexist as plural and complementary strategies.

Keywords: C-E poetry translation; academic poetry translation; literary poetry translation; plural and complementary strategies

^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项目编号:16BWW012)的成果。

1. 引言

与其他文学体裁的翻译一样,诗歌翻译的策略,也可概分为两种:学术性翻译与文学性翻译。前者注重译文的忠实性,后者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前者注重原文信息的传递,后者注重审美经验的传达;前者不讲究译文之语言,后者需用优美的英文来传达;前者为学术研究之目的,后者为文学交流之用心。

2. 关于学术性译诗

刘若愚(1990)^{绪论4}说:“译文旨在展示中国诗歌语言各方面的特征,因此就需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当然我也尽力使其具有可读性。如果可能,我将遵循原诗的诗体和格律。……我知道我的译文是良莠互见,但某些用笔的低劣则应归咎于对逐字翻译的必需或因使用了某些蹩脚的表现方法。其所以如此,目的是显示原诗的格律及语言特色。”这可以看作是学术性译诗的“宣言”。

学术性译诗虽然强调忠实,却不乏创造性。“当我们站在翻译的角度去看中国诗歌时,问题就变得越发复杂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陈腐的意象在译文中看来就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在那些对汉语一窍不通的读者看来,它们或许是既新颖而又感人的。‘秋波’是形容女子眼睛的一个陈腐意象,但如果直译成英语,即使是说不上造语惊人,至少也是有趣的创新。”(刘若愚,1990)¹⁴¹人们一般倾向于认同在意译中,或在文学性译诗中,译者的创造性有着比较明显的体现。因此,我们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在直译的过程中,又何尝不是体现着译者的创造性呢?在什么情况下能够直译、敢于直译,正说明了译者对于译入语或英语的良好语感。好的直译,如同作家对于所写作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功莫大焉。我们来看李白《望庐山瀑布》中两个诗句的两种英译: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英译一:

Flying waters descending straight three thousand feet,
Till I think *the Milky Way* has tumbled from the ninth height of Heaven.

—Tr. Burton Watson(译者华兹生)

英译二:

Its torrent dashes down three thousand feet from on high,
As if *the Silver River* fell from the blue sky.

—Tr. Xu Yuanchong(译者许渊冲)

“银河”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很是常见，华兹生将其英译为“the Milky Way”，属于意译或归化译法；许渊冲译为“the Silver River”，显然属于直译或异化译法。许氏如此英译，是经过认真研究而为之的。他曾提到宾纳(Bynner)的古诗英译：顾况的“水晶帘卷近秋河”，被译为“*They have opened the curtain wide, they are facing the River of Stars*”；李商隐的“长河渐落晓星沉”被译为“*And the River of Heaven slants and the morning stars are low*”。许渊冲评论说：“如果把‘天河’和‘星河’都改译成‘the Milky Way’，那读者只会看到现实主义的景色，译文却减少了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许渊冲, 1998)显然，许渊冲先生深为赞赏宾纳的直译法，所以才将“银河”译为“the Silver River”。如此英译的好处，显然可见。再看宋人杨万里的《小池》及其英译：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A Pond

The *fountain eyes* quietly treasure the tender streams,
The tree shadows reflecting in water love the sunny softness;
The young lotus blooms just shoot their sharp buds,
On which dragonflies have already settled their tender kisses.
—Tr. LIAO Changyin(译者廖昌胤)

将“泉眼”直译为“*fountain eyes*”，甚佳！如此可以丰富译入语，开发译入语的语言潜力。非有深厚之语言修养者，不敢如此直译，直译可以带来创造之美，是译者胆识和魄力的体现。再如树才《莲花》一诗中的两行：

我只是在学习遗忘——
好让偌大的宇宙不被肉眼瞥见。

I'm merely learning to forget—
Let that huge universe be unseen by *eyes of flesh*
—Tr. Denis Mair(译者梅丹理)

“肉眼”一般英文作“*naked eyes*”，译文以“*eyes of flesh*”出之，生动新鲜，令读者眼前一亮。英语语言的潜力，由此得以开发。

通过以上译例，学术性译诗的优点或优势，显然可见。

3. 钟氏之“创意英译”与许氏之“创译”

中国台湾学者钟玲提出“创意英译”的概念：“我把庞德、韦理^①、宾纳、雷克思罗斯等翻译的中国诗歌称为‘创意英译’，有别于以学术研究为目的而译的诗歌。后者的译者绝大多数是在欧美各大学东亚系任教的教授……这些学者的译作当然以忠实于中文原文为其翻译的原则。而庞德等的译作则以表达美感经验，将他们对中国诗的主观感受以优美的英文呈现出来为其目的，故称‘创意英译’。”（钟玲，2003）³⁴这与许渊冲所倡导的创译理论，正是一脉相承。如果说“创意英译”以“表达美感经验”“以优美的英文呈现出来”等为特征的话，浓缩于“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许氏译论，也可措以“美”“优”二字为其要害。许渊冲（2003a）¹⁶说：“我出成果，正是因为把创造美当成了人生的最高乐趣。”在2003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对照唐宋词三百首》序言中，许渊冲（2003b）首次拈出“创译”一词：“创译的特点是要发挥译语的优势，也就是说，要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概括成三个字，可以说是‘信达优’。……我认为新世纪的中外文学互译应该走创译的道路，希望创译能使我国的优秀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之中，使世界文化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光辉灿烂。”许氏的“创译”，似乎恰好是钟氏“创意英译”的简称；或者钟氏的“创意英译”，恰好是许氏“创译”的扩展，二者在精神上相通。

白芝(Cyril Birch)编的《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是一部涵盖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的两卷本选集，里面没有选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的诗歌，没有选陈子昂、高适、辛弃疾、晏殊等著名诗人的诗篇，却选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寒山的二十四首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因为寒山诗的译者史奈德(Snyder)在翻译的过程当中，采取了所谓“创意英译”的翻译策略，结果其译诗成为优美的诗歌。在白芝所编的这本中国文学选集中，中国文学史被改写了：在中国不入流的诗人寒山被提升至主流地位。此外，汉学界对史奈德的寒山诗译文之艺术造诣，也有着很高的评价。在《寒山诗三种英译文》(*Three English Versions of Han Shan's Cold Mountain Poems*)一文当中，赫伯特·法克勒(Herbert Fackler)将史奈德、韦利、华兹生的三版译文做了比较，并认为：在三版译文当中，韦利与华兹生的译诗本身乏善可陈，而史奈德译的寒山诗却组织紧密，自成缜密统一的循环，是重要的诗歌艺术品，因为史奈德“用了最为引人入胜的词汇”（钟玲，2003）³⁹。

许渊冲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发挥译语语言优势论，其实质是倡导译者充分发挥和利用译入语的语言精华。1994年，由许渊冲英译的《中国不朽诗三百首》被英国极负盛名的企鹅出版公司出版，这标志着许渊冲的古诗词英译开始走向世界，被国际译坛所承认；正如《读书》总201期105页上所说：“能否进入企鹅丛书也成为一种荣誉及被认可的象征。”许渊冲（2003a）³⁸¹也说：“《不朽诗》是企鹅出版的第一本中国人译的中

^① 原文如此，现一般译为韦利(Waley)。后文出现此译名不再附注。

国古诗词,因此,我也把这当成一种荣誉,当作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开路先锋。”总之,史奈德运用“最为引人入胜的词汇”的做法,恰好与许渊冲所倡导的发挥译语语言优势论不谋而合。创意英译也好,创译也好,都要求译者必须创造性地使用译入语语言,这样才能使译作提高到文学创作的水平,并进入译入语的文学领域。

4. 关于“创意英译”或“创译”的论争

许渊冲的创译理论,在国内一直存在着对立的两派意见,与之相似的是,美国的汉学界对创意英译的反应,也呈两极分化的趋势。美国汉学家对庞德英译中国古诗《华夏集》(*Cathay*)的反应,就是很好的例子。1957年,哈佛大学的汉学家亚奇力斯·方(Achilles Fang)在《佛纳罗沙与庞德》(*Fenollosa and Pound*)一文中,就指出《华夏集》乖离中文原意之处,指责庞德译文不忠不信。安吉拉·容·巴兰笛(Angela Jung Palandri)却称赞《华夏集》为英文诗之佳作,她说:“如果不是庞德为《华夏集》中的译文注入了生气,那么这些中国古代的经典对西方而言仍将是遥不可及的……”此外,休·肯纳(Hugh Kenner)等专家学者,对《华夏集》的艺术成就也很推崇,把它当作优美的英文诗篇。1966年以后,学者们大多把《华夏集》当作英文的佳作来研究和分析。(钟玲,2003)³⁸⁻³⁹但在国内,似乎还没有人把许渊冲的古典诗词英译当作英文的佳作来研究,这似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西方学术性译诗的代表,可举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 Bernhard)为例。如果说韦利的译诗因含有创译成分而可称为文学性译诗的话,高本汉的译诗策略,却正好相反:他的翻译方针是以学术需要来凌驾一切。高本汉完成了堪称逐字对译的《诗经》全译本。“这种决定牺牲诗意(甚至不考虑诗意问题)的译诗方法,注定高本汉的译本不会在汉学界以外产生什么影响,更不会吸引大量英语读者。”(孔慧怡,1999)⁹⁸虽然如此,在翻译批评界,学术性的译诗经常受到鼓励,而创译理论指导下的文学性译诗,却不时遭到批评。例如,1971年钟玲与雷克思罗斯合译《中国女诗人》,快完稿之时,在决定书名这件事上两人发生了分歧。李清照《一剪梅》里有“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之句,雷克思罗斯便主张用“Orchid Boat”为书名。当时两人都知道“兰舟”是指木兰树之木做的船,而非指“兰花船”,但雷克思罗斯坚持用“Orchid Boat”为书名,认为这比“Magnolia Boat”更富诗意。因为雷克思罗斯坚持诗意至上,钟玲便做出让步。译诗于1972年出版,书名为 *Orchid Boat: Women Poets of China*。1975年,郭大夏(Ta-Hsia Kuo)在书评中批评书名误解了“兰舟”的含义。在错误地被人认为学艺不精的压力下,钟玲给雷克思罗斯写信抱怨,雷克思罗斯终于让步,当1982年此书再版时,书名改为 *Women Poets of China*。也就是说,书名去掉了富有诗意的“Orchid Boat”。(钟玲,2003)⁴⁰⁻⁴¹由此可见,汉学界的批评意见,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创译或文学性译诗的成果。

5. 翻译批评之风的转向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创而译之的译诗,虽然在美国的汉学界最初曾遭到一些批评,责其不忠不信,但后来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汉学家转而开始研究和分析这些创意英译的优点,并把这些译作当作优美的英文诗来欣赏。在1977年美国诗人学会举办的“中国诗歌与美国想象力”会议上,与会的美国诗人一致认为:中国诗学论述对美国诗歌影响巨大。雷克思罗斯、史奈德、莫文、赖特都盛赞中国诗歌的创意英译。总而言之,一些中国诗歌的英译文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诗坛建立了经典的地位,它们的经典化主要由下述力量所推动:最主要的是,有一些英文文字驾驭能力强的美国诗人或译者把中文诗翻译为优美动人的英文诗章;一些重要的美国文学选集把这些创意英译选入,视之为具有经典地位的英文创作;美国汉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奠定了这些创意英译的文学地位;此外,还有一些美国诗人倡言其成就及影响力。因此,创意英译虽然为数不多,却在美国诗坛的经典系列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总之,在美国,“汉学界的学者已放弃了校勘式的批评,而由创意英译的角度来赏析译文。”“他们重视的是译文对读者的美学感染力,而非译文的忠信问题。”(钟玲,2003)⁴¹⁻⁴² 反观国内的翻译批评界,似乎仍以译文对原文的“忠信”为圭臬,而无视译文对读者的美学感染力,或者说对译文的美学感染力重视不够。国内学者愿意为创译作品背书的,似乎还只是少数。国外汉学界在汉诗英译翻译批评方面的倾向,正与许渊冲所倡导的文学翻译的方向吻合一致。可以说,强调译作本身必须具有相当的美学价值,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也是其关键点。

6. “学高于才”与“才高于学”

如果译诗的诗意不足,不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无论是译者因追求翻译的“忠信”而故意如此,还是因为力所不逮——其结果,只能是让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语译诗,在英语文化里面变得极度边缘化。这样,就不能使中国的传统诗词走向世界,也就不能达到翻译的真正的一——或者说是最重要的一——目的。“诗歌翻译在对译者语感和语言运用方面的要求,远较其他文类的翻译为高,这也正是为什么一般在大学教书的人尝试翻译古典诗词,会遇上那么大的困难:他们有的是专业知识,学者身份更可以是一种权威的象征,但如果中国文学英译变成有‘学’而无‘文’,那么译作的性质和功能,就和诗歌原来的文学功能脱节了。韦理和高本汉风格迥异的两种《诗经》译本,正好代表‘文’和‘学’两条道路;语言技巧和文学才华并不是去念研究院或拿个博士学位就可以换来的。”(孔慧怡,1999)¹⁰⁵⁻¹⁰⁶ 孔慧怡的此段论述,与许渊冲的“才学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许渊冲认为:译者应有才有学,但才、学体现在一个译者身上的不同,导致了译文的不同风格。学高于才的人可以译得忠实,才高于学的人却可以译得有吸引力。如果才、学都高,译得既忠实,又有吸引力,既不失真,又能存美,那自然很好。但事实上,这很难

做到。比如，朱生豪才高于学，所以译文“信”不足而“雅”有余。有人从才与学的角度对许渊冲的翻译实践做出评价：“许渊冲先生也是这么一位有才气的以我为主的翻译家，不仅和原作者平起平坐，他的雄心壮志是试与原作比高低，因此提出的口号不是接受挑战，而是和原作展开竞赛——自然，胜利的一方总是归于感觉良好的许先生。我的努力是以学者型的译者自勉，而许先生则恐怕是以作家型的译家自诩——当然，许先生的学问是令人钦佩的。”（方平，2002）作家型的译者与学者型的译者，正体现了才与学的两个方面，也体现了文学性译诗与学术性译诗的两种策略。我们来看《诗经·出其东门》中的一个诗节及其三种英译：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虽则如云，匪我思存。
 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英译一：

I went out at the east gate,
 Where the girls were in clouds.
 Although they are like clouds,
 It is not on them that my thoughts rest.
 She in the thin white silk, and the grey coiffure,
 She is my joy!
 —Tr. James Legge(译者理雅各)

英译二：

I go out at the East gate;
 there are girls (numerous) like a cloud;
 but although they are like a cloud,
 they are not those in whom my thoughts rest;
 (she with) the white-silk robe and with the
 black-mottled grey kerchief,
 she will rejoice me.
 —Tr. Bernard Kalgren(译者高本汉)

英译三：

At the great gate to the East,
 Mix crowds,
 Be girls like clouds,

Who cloud not my thought in the least.
 Gray scarf and a plain silk gown,
 I take delight in one alone.
 —Tr. Ezra Pound(译者埃兹拉·庞德)

对上述三种英译,廖七一做了详细而到位的分析:“前两段译文出自翻译家之手,其译文不能说是不忠实。与庞德的译文相比较,很容易发现下面几个主要的差异。①前两段译文句子结构较为整齐匀称,庞德的译文长短错落,形成句式上的张力;②前两段译文忽略甚至无视原诗的韵律,用散文翻译,第二种译文甚至就是分段的散文,取消了每一诗行的大写,而庞德却精心设计了 abacc 的韵式,读起来朗朗上口;③前两段译文将原诗隐含的意义连接表层化,补充了‘although ... it is not ...’的结构,形成显形衔接,而庞德维持原诗的隐性逻辑联系,简洁、紧凑,‘great gate’‘mix crowd’‘girls’‘clouds’‘gray scarf’‘plain silk gown’等自然构成意象的并置;④前两段译文因袭原诗的用词,重复名词‘cloud(s)’,略嫌呆板;而庞德创造性地将表示‘云’或‘云状物’的名词‘cloud’与表示‘遮蔽’‘使黯然’‘使模糊’的动词‘cloud’并列,形成意义的互补,并用表示‘人群’‘众多’‘拥挤’,带有动感的‘crowd’协韵,相互映衬,不能不说较前两段译文出手高明,更具诗意。学者型翻译家与诗人翻译家在诗体、语言、句子结构、韵式和翻译技巧上的差异与优劣一目了然。”(廖七一,2006)

《诗经·出其东门》英译一和英译二的译者是学者型翻译家,而英译三的译者庞德,却是诗人翻译家。如果前两者英译属于学术性译诗的话,庞德的英译却正是文学性译诗。

7. 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的并存

学术性译诗亦步亦趋,在文字上束缚手脚,以便忠实地再现原文的各种信息。未能充分再现原作之精神、之气韵,往往是学术性译诗的致命弱点。创译者之所以能够放开手脚,发挥优势,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学术性译诗的缺陷;结果,其译文常常是一流的文字,正如原文是一流的文字一样。至于所谓译文的“不忠”“不信”,又当具体分析、具体研究。有的“不忠”,为文字层面上的“不忠”,精神气质却正吻合;有的“不忠”,是表达内容上的“不忠”,是因为译者把自己对原诗的理解,或者说译者在阅读、翻译原诗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联想,在译文当中表达了出来;读者在读原文时,如果没有与译者产生同样的联想,自然就会认为译文“不忠”,认为译者在天马行空、随意发挥,在以“翻译”之名,行“创造”之实。这样的读者批评意见,译者知道后,自然也不服膺。译者并不认为自己的译作“不忠”,因为他只是把自己阅读原作时所产生的联想,非常“忠实”地传译出来。译者忠于自己的阅读体验,也就是忠于原作——除非译者阅读原作时,确实存在着误解和误读。诗无达诂,就是说在合理的理解范围之内,不同的读者对原作可以有不同

同的解读。如果说有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有一千个译者便有一千种不同的译文,这当然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这一千种译文当中,究竟哪些才算忠于原文?问题的答案,恐怕仍然是:有一千个评判者,便有一千个不同的答案。因为,译文的评判者,毫无疑问地又成了译文的读者;而作为读者,如前所述,因其想象力的不同,因个人经历、个人感悟、世界观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往往人异人殊、见仁见智。

总之,诗歌文本的开放性与多解性,为译者提供了再创造的空间。学术性译诗重在追求学术上的正确性,虽然在语言层次上精确而忠实,却往往缺乏文学作品所应有的感染力。文学性译诗重在追求诗歌的美感体验,自然充溢着浓郁的文学气息。因此,如果说学术性译诗可以满足学术研究之目的的话,文学性译诗却可以达到文学与文化交流之目的,并进而促进世界文学之繁荣。与此同时,学术性译诗所采取的大胆直译,有时却也可以给译文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给译诗带来浓郁的诗意。因此,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作为汉诗英译的两种策略,将长久并存,以达多元互补之目的。

8. 小结

“正是通过翻译这个中介,每个民族都看到了本民族语言—文化系统的局限,都从对方民族的语言中借鉴、吸收了有益的成分,丰富了本民族语言的词汇,加强了语言的表现力,扩大了精神视野,修正了传统思维方式,这样,翻译就为民族文化向世界文化转化、民族语言返回到‘普遍语法’、民族诗歌转化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提供了可能性。”(张德明,1998)如果说庞德时代的汉诗英译令西方读者感受到一个没有语法、没有逻辑的优美意境的话,“五四”以来的英诗汉译,则让中国的诗人们看到了一个逻辑清晰、理性充盈的诗意世界。对于当前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汉诗英译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至于翻译的策略,无论采取学术性译诗还是文学性译诗,都应该体现译者的创造性,并注重汉诗美感与诗性在英文中的再现。如此,则功莫大焉。

参考文献:

- 方平,2002.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60.
- 孔慧怡,1999.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廖七一,2006.胡适诗歌翻译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38-140.
- 刘若愚,1990.中国诗学[M].赵帆声,周领顺,王周若龄,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许渊冲,1998.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论:再谈发挥译文语言优势[J].外语与外语教学(6):35-39.
- 许渊冲,2003a.诗书人生[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 许渊冲,2003b.汉英对照唐宋词三百首[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序9-10.
- 张德明,1998.人类学诗学[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306-307.
- 钟铃,2003.美国诗与中国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张智中,男,1966年8月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典籍翻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职。研究方向为汉诗英译,发表相关论文11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108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1项。专著《汉诗英译美学研究》和译著《唐诗绝句英译800首:中英对照》分别获天津市第十五届和第十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